

※「魏晉南北朝周邊形象」專輯※

求道、靖邊與流浪 ——重探《水經注》「域外」書寫

朱先敏*

一、前言

如果曾經聽聞研究天文奧秘的學者談論今人對無垠宇宙的學說，會驚訝地發現，許多理論其實源於大膽地揣想，而等候時間的證明或反駁。這似乎說明了，人類立足所在之地，極目眺望視野盡頭，試圖探索知識邊界的勇敢與韌性。與天文相應的地理學，比起與地景相關的文學創作，如遊記、征賦、山水田園詩，往往也被視為實用的、追求「真實」的一門客觀又科學的學科。而這樣的學科是否也擁有想像和揣度的空間？當地志作者觸及了自身經歷的極限，碰觸到陌生的邊地，他如何描寫、如何查實，又如何呈現一處陌異的風景給予與他同樣對彼方一無所知的讀者？書寫當下的取材、主軸和筆法因而碰撞出想像與真實之間無窮的可能。

寫作於西元六世紀的《水經注》，是北魏酈道元透過實地考察、文獻考據、遍覽奇書之後所寫成的一本地理志。古往今來的注疏家和研究者大多肯定酈道元對北方諸河道及沿岸的翔實考察，同時也對酈道元因政權對峙而無法抵達的南方諸卷感到猶豫、質疑¹。如果親歷當地、親眼考察是地理書寫之所以可信的唯一標準，那

本文於2020年6月24日於中研院文哲所劉苑如、楊玉成老師發起的「魏晉南北朝及周邊世界」讀書會上報告。感謝楊玉成老師的評論及讀書會上劉苑如老師及各位學友參與討論。兩位匿名審查人更提出許多細膩深刻的修改建議，在此謹申謝忱。

* 朱先敏，國立臺灣大學「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研究員。

¹ 戴震認為，酈道元因為沒能親自前往塞外和江南，因而書寫多有錯漏。參〔清〕永瑤等編撰：〈史部·地理類二·水經注四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卷69，頁1489-1490。此看法後來成為對《水經注》評價的普遍共識。

麼比起依舊能交通、移動、以相同的語言訴說和紀錄的南方，《水經注》的域外書寫或許是更值得探索的篇章。《水經注》內容依循著流通南北、綜合東西的各條水系，書寫範疇包含漢帝國既有的統治範圍，以及北魏、南朝在著書當下所控制的疆域，也涵括了當代的韓國、印度、巴基斯坦、中南半島及中亞。明代註疏家曾經對酈道元超出既有疆域的記載感到不解，如楊慎感嘆「汎引佛怪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矣」、黃宗羲譏為「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王世懋批評「流濕之外，贅引紀異」²。楊、黃二人批評的對象主要是〈河水注〉裏述及恆河的段落；王世懋雖未明言，但也暗示著他並不認同酈道元溢出國境之外的書寫。這是因為地理志這種體裁從《尚書·禹貢》作為源流開始，乃至歷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官方編修的地理總志，一直都肩負著為朝廷分疆劃界、調查風俗物產以為統治之用的目的³。既然基於統治的實用目的，實地考察、親眼見證的標準因此似乎成為必然。在關於地理景觀的各類描寫中，地理志這種體裁沒有浪漫感性、道聽塗說的空間。因此，酈道元為什麼納入了自己未曾親身探訪，也未曾有官方考察、統計過的遙遠他方？

時至當代，學術分類上將這類疆域之外的描寫稱作「域外」。這種分類方式明確的劃定疆域的界線，然而，誰屬域內？誰屬域外？歷朝變動不居的國界線致使「域」的劃界變得曖昧模糊，甚至凸顯出了書寫者或研究者本身的政治立場或意圖。例如，戴梅可 (Michael Nylan) 便將《水經注》所認可的疆域比附到漢帝國之上，認為《水經注》許多景點的選擇、疆界的劃定都隱含著朝向強漢的認同和欽羨⁴。陳橋驛曾寫作多篇關於《水經注》域外地理的考證文章，將酈道元關於域外的

² [明] 楊慎：〈水經序〉，《升庵文集》，收入〔清〕紀昀等奉敕編：《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1307冊，頁17-18；[明] 王世懋：〈重刻水經注序〉，《王奉常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第133冊，頁293；[明] 黃宗羲：〈今水經序〉，《今水經》，收入《河海叢書》（臺北：廣文書局，1969年），頁2。

³ 《隋書·經籍志》以「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說明地理志的書寫目的，是為了統治者因地制宜之用。〔唐〕魏徵等撰：《隋書·經籍二·地理》（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33，頁987。

⁴ Michael Nylan, "Wandering in the Ruins: The *Shuijing zhu* Reconsidered" in *Interpretation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s. Alan K. L. Chan and Yuet-Keung Lo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書寫分為「曾受中國管轄」和「未曾受中國管轄」兩類⁵。他的貢獻在於彙整、羅列《水經注》各處描寫非長期屬於漢文化地區的段落，但文中試圖強調的是，酈道元介紹少數民族的貢獻，將中國統治雲南、貴州乃至越南中北部視為既成事實，對於印度、柬埔寨等地則不多談。David Felt 標舉〈河水注〉探討崑崙山實際方位的段落，認為酈道元以崑崙山為分界，將世界觀分為崑崙山以內的內部世界（中國）以及外部世界（印度）；並以儒教和佛教作為文化上兩個相互映照的對立面⁶。無論是對漢帝國的追溯，以是否受過中國管轄為評價標準，或將印度視為外部世界，都顯示出當代研究者自身關於民族國家的認知。酈道元是否將印度和林邑（今之越南中南部）、夜郎（雲貴一帶）視為截然不同的兩個區域？印度屬於外國，而林邑、夜郎與黃河一帶同屬中原？還需要回歸到《水經注》的結構、書寫方式、採用文獻，以及著述內容來討論。

本文以大篇幅記述恆河流域的〈河水注〉和記載林邑國歷史的〈溫水注〉為例，探討酈道元怎麼將記述的重點延伸到遙遠的異國，他寫下了印度和越南的哪些面向、採用了誰的記述與視角？〈河水注〉呈現出寫下《佛國記》等求道的僧人一路南行，由中土朝向印度北部的「中國」，再到恆河流域的多摩梨帝國。〈溫水注〉則由曾經的夜郎國、漢代以後的牂柯夜郎縣寫起，接著進入和夜郎關係密切的林邑國；注中大量採用〈林邑記〉。〈林邑記〉今已亡佚，成書年代和作者不詳。據學者考證，林邑對西晉朝貢，東晉開始衝突不斷，成為朝貢與衝突並行的交通模式，元嘉年間由檀和之攻陷。〈林邑記〉應寫成於劉宋年間，由中原前往林邑的文人所作⁷。或許〈林邑記〉正是一篇隨軍文人寫下的征行記，如此便能解釋文中記載的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且林邑的山水建築、動物風俗都充滿奇詭的敵意。此外，

Press, 2010), p. 64.

⁵ 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熱帶地理〉、〈《水經注》記載的兵要地理〉、〈《水經注》記載的域外地理〉，《水經注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38-148、177-194。

⁶ David Jonathan Felt, *Pattern of the Earth: Writing Ge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unpublished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4), pp. 394-439. *Structures of the Earth* 改寫自 Felt 2014 年的博士論文 *Pattern of the Earth: Writing Ge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因兩本書從題目到內文都稍有不同，故本文並列為參考書目。David Jonathan Felt, *Structures of the Earth: Metageographie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1).

⁷ 郁沖聰：〈新增知識與既有思維的交融：論六朝地記與南海諸國〉，《雲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頁152。

俞益期寫給韓康伯的書信也是〈溫水注〉介紹林邑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俞益期在文獻上少有其他生平佐證，《水經注》稱其「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因此自我流放到了林邑⁸。在林邑，他寫信給遠在中原的友人，講述異域見聞。由上述討論可知，同樣被揀選、納入《水經注》的記載，其實有著完全不同的著述動機和生成環境。基於求道而寫成的《佛國記》，刻畫下天竺風土，為求靖邊、自我放逐的〈林邑記〉、〈與韓康伯書〉則奠定讀者對中南半島的印象。不同的記述重點、不同的視角使得天竺和林邑有著不同的風情，而讀者必須辨析的是：如此歧異的異域風情，是地理事實的反映，抑或書寫者操作的結果？

陳橋驛認為，〈溫水注〉的記載比〈河水注〉更有價值，因為僧侶遊記至今仍有全本傳世，也保留在許多類書和佛教典籍中。然而〈林邑記〉、〈扶南記〉等作品早已亡佚，如果沒有《水經注》，後人將難以得見南北朝視角下的越南和柬埔寨⁹。〈林邑記〉和〈扶南記〉的佚失，使得本文難以將原文和引述進行對比，以此解讀酈道元作為書寫者的權衡經營。雖然如此，從〈河水注〉和〈溫水注〉中天竺和林邑氛圍情境的對比，以及一國境內風景的一致性，或許仍可窺見書寫者對一地風土的呈現，其實受到許多人為因素的影響，並非「自然」的反映和轉印。

《水經注》所收錄印度和中南半島的相關文獻，除了有保存典籍之功，更重要的是，揭露酈道元如何設想這個世界、他如何容納陌生的異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及他如何援引個人的經驗和記述去介紹那些自己也曾涉足的他方。除此之外，對於《水經注》「域外」書寫的討論，還觸及一個《水經注》學史的問題：前人在解讀《水經注》為何述及酈道元從未親至的南方諸流時，往往認為這是因為《水經注》涵蓋的範圍是以漢帝國固有的疆域為標準，因此將這個行為視作酈道元紙上重現統一版圖的具體表現¹⁰。那麼在這樣的解讀邏輯之下，將難以安放〈河水注〉和

⁸ 陳昱珍指出，文廷式和黃逢元的《補《晉書·藝文志》》認為，俞益期即為俞希。陳昱珍：《〈法苑珠林〉所引外典研究》，《中華佛學學報》第6期（1993年6月），頁319。俞希在《隋書·經籍志》被著錄為將作大匠「喻希」。《全晉文》據此將〈與韓康伯書〉繫名其下，稱「希字益期。豫章人。升平末為治書侍御史。累遷至將作大匠。有集一卷」。〔清〕嚴可均：《全晉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225b。不過俞希是否就是俞益期，並沒有明確的證據，俞希也沒有自己的本傳。

⁹ 陳橋驛：〈林邑國城市〉，《酈學札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393。

¹⁰ 陳橋驛認為，酈道元因為南北分裂而不能前往南方，只好通過閱讀來領略江南山水之美，並在雙方處於敵對的情勢下，依然熱情地描寫了南方河山，使用南朝的年號。這都是基於迫切希望看到

〈溫水注〉中北天竺、「中國」、林邑和扶南與中原固有疆域的內外流通、少見明確疆界的描述手法。由此可見，酈道元對異地的想像與接納，或許已非簡單的政治疆域所能概括。

二、求道視野下的安詳天竺

誠如陳橋驛所言，僧侶遊記是當代可見的一個重要文類；不論在宗教史或地理史上，都是非常可貴的材料，也是後世認知中古時人如何認識印度一帶的重要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以求道為目的的遠行，本身就有「求索」和「朝聖」的意圖。因此，僧侶對苦行、距離的描述，跨越國界之難和抵達目的地的愉悅和充實，不只有地理上的如實闡述，也包含心理的需求，以及受到文類傳統的影響。田曉菲從行旅文學的觀察視角下，看出《佛國記》本身是一部完整的、有明確的順序，並受到求道類型文本的傳統影響的著作¹¹。因此，法顯所選擇描述的景點，對旅程或為險阻或為平順的鋪排，甚至描述時的立場和視角，都因著求道的目的、僧侶的身分而有所影響。比方說，當法顯描述焉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時，他要強調的不是該地居民的文化和習俗與漢家不同，而是焉夷國人的態度造成他們求道之行的阻礙。甚至導致法顯必須與同伴分道而行、各求資給的困境。而當法顯描述蔥嶺以西「草木果實（與漢地）異，惟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時，他也不是

強大而統一的祖國的信念。感謝審查人的提醒，其實陳橋驛基於現代民族國家所標舉的統一信念，和古代士人酈道元對王朝的忠誠，已有所差異。酈道元對北魏的忠誠不一定會以廣納南方諸流、冀望南北統一作為表達方式。而酈道元寫南方水道、寫沒有疆域疑慮的中南半島與印度時，並沒有做出明確的內外、人我之別。因此，如果以書寫南方諸流象徵統一意圖的說法，帶有一種「書寫」就等同於「擁有」的假設，那麼〈河水注〉和〈溫水注〉關於域外的段落，則是這一假說的強大反例。除此之外，鮑遠航則指出，酈道元在《水經注》上寄託了促成王朝生產、用夏變夷的事功心態。陳橋驛：〈酈道元和《水經注》以及在地學史上的地位〉，《酈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53；鮑遠航：《〈水經注〉與魏晉南北朝地理文學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頁108、136-196。

¹¹ 田曉菲在討論中國行旅寫作時，舉出法顯《佛國記》的幾個特點：其一，法顯這趟求道之行關注的是佛教的聖蹟，因此他所記載的都是與佛陀相關的歷史景點。其二，他對這趟旅程的敘述，符合天堂／地獄模式，強調的是刻苦行路之難和佛國祥和平緩之美。其三，在佛家的世界觀裏，佛祖的出生地是世界的中心，來自中原的法顯反而被稱為「邊地之人」。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80-102。

要記錄該地產物，因為全書述及物產的次數極少。這段敘述重點在於下接「從此西行向北天竺國」，顯示出法顯一行為了求道，已經勇敢往陌異之地行去，而且越來越接近佛教信仰中的「佛國」¹²。

然而當酈道元選取《佛國記》中的段落解說河流沿岸的地理景觀時，作品完整的結構被破壞，作者的意圖被抹消，求道朝聖的意圖以及為之服務的編排和隱喻，也隨之失效。法顯對天竺的描述，因而成為了看似客觀的觀察和記錄。比方說，當酈道元的筆鋒從中原跨入天竺境內，他是這樣說的：

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黃帝宮，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¹³

《水經注》遵循著《水經》原文「崑崙墟，在西北」，從崑崙山的位置寫起。酈道元引述《禹本紀》、《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前代文獻說明，此地不僅早已存於古人記述之中，且處於周朝與域外的關隘。周穆王要往西之前，需要先與居於此地的河伯馮夷相見，進行一套「沈珪璧禮」、「披圖視典」、「觀天子寶器」的儀式，接著河伯才「導以西邁」。周天子與西王母相見之前正是從此入於宗周，是中原與外地、人與仙的交界。不同於《水經》描述黃河源起崑崙山最終流入渤海的概述，到了經文「屈從東南流，入渤海」下，酈道元以阿耨達太山將描寫對象從中原拉往印度。

《水經注》所述河流多半彼此相交，然而此處酈道元倚靠的是黃河與新頭河

¹² [東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9-12、21。

¹³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6-17。

(即印度河)同出於阿耨達太山，才能將新頭河納入書寫範圍。酈道元寫新頭河一如穆天子西邁，並不「自然」也不「輕易」。而是主事者經歷一番努力才輾轉抵達的目的地。寫及新頭河時，酈道元引用了郭義恭《廣志》、康泰《扶南傳》，最終以法顯《佛國記》「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明確地跨越了國界的範圍。如果只看《水經注》，很容易以為這是法顯進入異國的起點。然而考諸《佛國記》，法顯在入北天竺境前早已經歷了乾歸、耨檀、張掖鎮、敦煌、鄯善、焉夷、于闐、嶺東六國、子合、於麾、竭叉等國，即使已入北天竺，在橫越新頭河前，還先經過一個小國陀歷¹⁴。在這段歷程中，他們經歷了惡鬼、熱風、在沙中行走、雪山、毒龍，也遭遇了不友善的小乘佛眾，並曾受到豐樂殷盛的大國款待，見識了盛典和寶物。但這一切都沒有阻礙他們走向最終的目的地。

回到《水經注》關於天竺的記載，會發現酈道元將這段旅程中漫長的經歷、人與人之間的遇合、旅途中的誘惑全都裁去，只留下渡新頭河「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的艱難。又是鑿石通路，又是躡懸絙過河，其狹其險，連前代的遠行者都未曾抵達。只擷取這一段敘述時，似乎將法顯對天竺的尋求推向一個中原人探索異地的極限。接下來酈道元更補上了他在其他文獻裏搜索的證據，證成了這一帶的地理景觀著實艱險：

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磐石之陞，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秣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援飲也。有白草、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¹⁵

當罽賓被從乾歸到竭叉一路的險阻和艱困中獨立出來，又補上史傳中關於此地道狹阻險的介紹，以及郭義恭「山溪不通，引繩而度」的描述時，求道的虔誠信念退去，作者描寫時對險途的強調，從部分的修辭成為徹底的事實。對於那些未曾從長安往天竺行去的讀者而言，中原之外就是一道天險，懸度之後則是北天竺。《水經注》片段式地援引僧侶求道的見聞，作為河道沿岸的補充和佐證，同時也一併承接

¹⁴ 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頁 2-33。

¹⁵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 17。

他們對異地的感官和記憶。當求法之旅成為實地見聞、佛國記載成為地理總志，則許多人為主觀感受、書寫技巧都轉換成了不在場的讀者唯一所知的地理事實，並凝結成了異國的印象和氛圍。

於是，在過了懸度之國後，「兩岸平和」的描述便不只是法顯心願得償的具象，而是成了當地地理景觀的「事實」。接著，讀者便可跟隨印度境內的諸條河道，自在地悠遊於佛法神蹟的籠罩之下。酈道元順著新頭河寫到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接著再以阿耨達太山西南的三條小河入恆水（即今之恆河），而連帶寫到了恆水流域。恆水流域主要仰賴支僧載《外國事》、竺枝《扶南記》、釋氏《西域記》、竺法維《佛國記》引述大量的佛教掌故和遺跡。最後再回歸崑崙山確切位置的討論，反駁前人以為崑崙山即是阿耨達太山的舊說。一句「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乎？」說明在這圓轉自如、羚羊掛角的地域變遷裏，酈道元其實清楚地意識到，何處是胡國、何處是中原。因此，前文輾轉婉曲才能建立的黃河與恆河的連結，並不是酈道元流失之外的贅語，也不僅是地理事實的爬梳，而是強調了恆河與黃河之間的距離和疏隔。這使得崑崙山絕非阿耨達太山的推論更具說服力。正因為酈道元對「彼」與「此」的分梳如此鮮明，對寫及天竺的意圖表達得如此清晰，大量援引《佛國記》等僧侶所著的求道遊記之後，所呈現出一片祥和的佛國，才更顯得破綻百出、值得玩味。

依循著恆水往前奔流，酈道元對河岸景點的描寫無一不是佛國遺跡。例如在拘夷那竭國南雙樹間，他引《佛國記》指出，此地是佛泥洹後，分舍利、行葬禮處，大迦葉尊者曾在此處因佛陀而哭嚎，甚至感動天地，此後有了薪不燒而能自燃的神蹟。接著是竺枝《扶南記》介紹舉國事佛的林楊國，國中有人以數千束樵焚燒屍體，六十餘年屍仍不朽。接下去則是《佛國記》記載賢劫千佛與生母分離幾十年後意外相認、放下武器化解干戈的放弓仗。釋氏《西域記》和竺法維《佛國記》都提到佛下三道寶階的為母說法的奈揭城。恆水東流，經過佛嚼楊枝、種在土中後，生長七尺不生不滅，至今可見的神蹟。接著流經的是佛母生子的井池、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處¹⁶。恆水流經的地點，無一處沒有佛家史蹟，這似乎讓天竺境內成為一個處處是佛跡的佛國。結合文中對當地人們富足祥和的敘述，更證成此地因佛法昌盛而百姓安樂的狀態。然而，從前文酈道元對國界、胡漢的強調，再到每一處景點

¹⁶ 同前註，頁 30-32。

詳細的文獻出處，都說明了酈道元為這群未能親炙佛國的讀者所寫的，是一個自己也不會去過的陌生他方。這些出於宗教文獻、僧侶遊記的記載，固然出自僧人旅行所見，但他們為什麼選擇這處景點，為什麼介紹這則史實，都與他們出行的目的有關。而當語境被拆解、拼貼進地理志裏對沿岸地景的考察，聖徒心境就被地志作者肯認，成為了純粹的地理事實。讀者不再能辨認《佛國記》裏對艱險旅途的描述中潛藏著多少不同層次的描述：那是地理景觀的觀察，也是朝聖者的心理感知，更是書寫時的修辭和鋪陳。因此，通過《水經注》剪裁後所認識的天竺，就成了一種架空在書寫之上的異國印象。

更重要的是，為了強化這樣的印象，酈道元甚至裁去一些不符合祥和佛國記述的記載。例如迦維羅衛城，在〈河水注〉裏強調的是「故白淨王宮」、佛母生太子處、太子與象角力、太子射箭入地處。而《佛國記》中「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有眾僧民戶數十家而已」，此國「大空荒，人民稀疎。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的描述卻被略去不談¹⁷。轉而補上《外國事》裏今有優婆塞為白淨王裔，而且尚精進、有古風、彌更修治的記載。另外，還添上竺法維《佛國記》稱迦維羅國是佛所生天竺國，是地中央，以及康泰《扶南傳》記載潭楊國人聽聞天竺「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其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的盛景¹⁸。由此可見，地理書寫是一個雙向、不斷流動、重複疊加的人為產物。書寫者固然受到所取用素材的影響，他自身的選擇和剪裁也強化且複疊了這全境一致、固定不變的異國印象。酈道元有意的設計鋪陳，還展現在他對預設讀者的設想。《水經注》雖然在地名和風俗明白標舉出他鄉和中原的差別，但酈道元顯然知道自己預設的讀者仍身處中原文化，在敘述上也一再凸顯天竺和中原之間的相似。譬如自新頭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¹⁹。事實上據陳橋驛考證，此處中國指的是古代恆河中游的中印度(Madhyadesa)，而非中原(Tchina)²⁰。孫英剛在研究中古整體的知識體系和佛教之間的碰撞時，強調了「地之中也」的重要性。處於世界的核心是中國立基之本，是自

¹⁷ 感謝審查人提醒迦維羅衛城在《佛國記》中的豐富形象，讓本文得以討論酈道元對《佛國記》的剪裁和挑選。參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頁 81-86。

¹⁸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 32、37-38。

¹⁹ 同前註，頁 20。

²⁰ 陳橋驛：〈梵語地名〉，《酈學札記》，頁 224。

我認知和自我標榜的關鍵。佛家以佛陀誕生的天竺為中，以中國為邊地，顯然與中國固有的自我認同產生扞格，也因而形成佛教初入中國時兩種文化體系的張力²¹。而在酈道元對《佛國記》的剪裁、挑選、引用中卻避開了天竺與中原誰為中心，誰為邊地的對峙。有別於《佛國記》中「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平鋪直敘的描述，酈道元以一個「故」字強調北天竺「服食與中國同」，才是此地名為中國的原因，這加強了風俗和命名之間的因果關係，也建立了中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羈絆²²。

又如前文引述放弓仗故事，內容講述賢劫千佛自幼與母分離，長大之後在戰場意外相逢，母親噴出乳汁，兒子以口相就，因而順利相認的奇事²³。而在卷五〈河水注〉裏述及滑臺城（今河南滑縣）時，同樣以劉宋武將朱脩之兵敗城陷，其母同日乳汁驚出之事來強調母子之情。一河南，一印度；一神話，一史事；一佛，一人的故事，位居一條黃河的起首和終結，卻同樣以母乳不得時而湧出的情節展現不為人事阻礙的情感。誠然，賢劫千佛和朱脩之母子故事的發生地，是客觀的地理事實，但選擇哪些故事、強調哪些景點，能夠使得天竺與中原、黃河的首尾呈現這樣的相對、呼應，仍然關乎作者的選擇。透過一則漢文化中乳汁驚出的故事，賢劫千佛的母親噴出乳汁、呼召親兒的奇蹟，從遙遠的異國神話成為跨越國界的同情共感。而原本可能出於特定宗教的神蹟奇事，也轉換為母子之間相應、相感的人之常情。由此可見，酈道元有意將讀者和他所書寫的地域拉近距離，這樣的「有意為之」，顯示出作者在《水經注》這樣一本地理文獻中的影響力和能動性。當地理事實經由書

²¹ 孫英剛：〈洛陽側影與洛州無影——中古知識世界與政治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頁2-9。

²² 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頁33。

²³ 「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于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捋乳，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參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27-29。

寫者選擇、描寫、拼貼之後，地理志的內容不再只是事實的複刻和轉印。因而能將「地理事實」和「地理書寫」拉開距離。

由上述討論可見，酈道元所呈現的恆河流域宗教意涵濃烈，行數十步便能遇見佛母生太子所拔之樹、佛苦行六年坐脩之樹及佛說戒處。但如果將〈河水注〉中與天竺相關描述的討論放大到《水經注》其他域外書寫，便會發現同樣宗教氛圍濃厚、有自己獨特文化的中南半島，在酈道元筆下呈現與天竺截然不同的情調。這或許暗示著，當酈道元以作者的眼光和文筆影響了讀者如何理解一地風土時，他的書寫其實也不可能自外於自己所選取，或者所能見到的引述文獻。一旦書寫者可見的文獻出於不同的體裁、因不同的目的而寫，則地理志所述及的地域便有了截然不同的風情。而這樣的轉譯過程，將會因為長期以來地理事實和地理書寫缺乏明確的分野，而讓特定視角下的異域成為刻板的印象。正如《水經注》為讀者呈現的溫水流域、越南境內，滿布的都是戰爭的遺緒和蠻荒的意象。

三、征途所經的西南蠻荒

溫水出自夜郎縣，因此注文從夜郎國寫起。經文簡要描述溫水起迄，而且只寫到「領方縣（今屬廣西賓陽縣）」為止：

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于鬱。²⁴

經文留了一句「（溫水）東北入于鬱」作為〈溫水〉篇末，卻沒沿著鬱水往下寫。透過酈道元的注文才會知道，鬱水一路南流，一直流到了交趾。酈道元正是透過鬱水的河道流向，將敘述從牂柯帶往林邑，離開了他熟悉的漢文化範圍。由經文和注文的對比可以看出，《水經》作者和酈道元對於地志邊界的想像並不一樣。即使水流潺緩、流向不定，所流經的範圍並非人為的國界疆域所能局限，《水經》作者卻能決定自己的書寫範疇只到領方縣為止。酈道元則選擇沿著河道往前推進，直至邊界之外的邊界、蠻荒深處的蠻荒，那一個雖不至於從未有人涉足，卻人煙罕至、記載和認知都只是星星點點的陌生地域。

雖然直到「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一句，才進入相對於中原文化的「異國」

²⁴ 同前註，頁 2974-2984。

範疇，但從〈溫水注〉伊始，就可以看出這是一方在歷史和文化上都與中原相距甚巨，甚至時有衝突、流血和戰爭的土地。溫水起源於夜郎，此處在漢武帝時才由唐蒙開為縣，在此之前是南越國的屬國。溫水隨即流經味縣，此處從前是滇國的國都，一直到諸葛亮平南中才建立了建寧郡。這一帶仍然留有獨特的風俗，譬如「語言不同，嗜慾亦異」的木耳夷，也有自己的信仰中心及與之相應的降生神話。夜郎人信奉的竹王死於唐蒙開縣之時，此後溫水流域便滿布戰爭痕跡。譬如早期附屬南越的夜郎，得派出精兵陪著漢兵去打南越。流經此處的各條河流也見證著漢平越、晉平吳的史事。從這一段簡要的注文，可以看見的是，酈道元足以汲取的知識範疇，因著距離的遙遠、交流的稀少，《水經注》所能援引的材料相當有限。而從這有限的材料裏我們可以看到，歷代文獻所記載的紀錄幾乎都與戰爭有關。換言之，這是一個為了拓展疆域、爭奪領土、平息隱患才會涉足的邊界。而鬱水流域濃厚的異族氣息，更隱含了族群差異所產生的張力和緊繃。例如，合浦縣著名的「合浦珠還」的故事，在《水經注》裏亦有記載：

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苛，珠徙交趾，會稽孟伯周為守，有惠化，去珠復還。²⁵

合浦珠還的成語強調的是德政而珠還的奇蹟，但如果往前爬梳，追問珠子為何離開合浦，則漢人官員和異族人民的緊張關係，以及因為身處邊地而近乎土皇帝式的肆無忌憚，就會浮現出來。因「不產穀」而「多採珠寶」，因多採而導致的「珠徙」，更在自然與人事相應的神奇之外，又增添一份人為濫採導致的生態隱憂。在意象上和道理上，交趾人民所承受的壓力和暴虐都在這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中浮現出來。而考量到酈道元身處中原所能獲知的文獻範疇，也不能不感歎合浦人民的困境，僅有在貢品未能如數繳交時，才能在文獻上被留存下來。

中原和他族之間的暗流，在「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一句話中引爆了衝突。這句描述，除了再一次強調夜郎縣見證廝殺和爭奪的地理位置，也將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異再一次拉開，從昔之異國、今之郡縣裏潛藏的族群差異，轉向中原王朝久攻不下的鄰國，把描述的重點轉向林邑。林邑相關的記載主要依據《林邑記》——一個可能是隨軍前往攻打林邑的漢族文人所書寫的林邑地志，其中自然充斥著中原帝國與林邑人的鬥爭。從秦朝在越南北部設象郡、漢代設日南、九真起，南方的林

²⁵ 同前註，頁 2992。

邑便不斷發起反抗與戰爭。由今之地理知識來看，中南半島密林遍布、氣候物種都與中原大不相同，但《林邑記》卻未如《佛國記》般強調跋涉之難：

《林邑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甃城二丈，上起甃牆一丈，開方隙孔。甃上倚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宮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居周繞，岨峭地險，故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多城壘，自林邑王范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²⁶

雖有「阻峭地險」，但強調的是「兵器戰具，悉在區粟」、「秦餘徙民，染同夷化」，連熱帶特有的山林雲霧都有「非生人所安」的引申之意。與〈河水注〉提到中土與北天竺之間的懸度之險相比，更可見兩類描述的差異。罽賓之境的困境是「天險」，人們通過開鑿山壁建立了聯通的管道，彼與此之間是合作的狀態。這一處的險，是上天為修道者所設的障礙，這裏的阻礙目的是為了跨越。同樣有地險，林邑國的「險」卻是「據險」。林邑人占據地利之便，搭配著城牆、武器，將天險轉化成了攻守之勢。此處的險將人們區隔成了對立的兩方，這裏的阻礙為的是抗拒。

天竺和林邑兩地的人民，自然在種族、歷史、文化上都與漢民族相當不同，但在〈河水注〉裏我們看到的是「服食皆與中國同」的中天竺，還有因為宏宣佛法而「競行仁義」的人民。而在〈溫水注〉裏，林邑人的文化差異被強調了，「染同夷化」的敘述、「舊風變異」的觀察、「非生人所安」的評斷，在在顯示了中原與林邑的差距。即使曾經有秦時徙民的歷史因緣，卻仍抵不過當地其他民族和風土環境的薰染。而對「日影度南八寸」的說明，除了解釋日南郡的命名由來，更考慮到「中國為地之中」的理論依據及「洛陽無影」的朝野論述；對日影量測的強調及對度南八寸的精密紀錄，強化的是林邑地處邊境、非我族類、亦非正統的印象。因此，中原王朝與林邑國之間的交流，幾乎全為血腥的戰爭史：義熙九年，擒斬林邑王二

²⁶ 同前註，頁 2997。

子，王敗逃；元嘉元年，趁陽邁王不在，交州刺史進占區粟，雙方大戰；元嘉二十年，因為林邑沒有及時上貢，劉宋派兵攻打區粟，「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坑截無赦，樓閣雨血，填尸成觀」²⁷。

單看這些條目，漢人似乎成為不義的侵略者，但搭配了《林邑記》裏將林邑文化及自然環境無限趨近蠻荒的描述，不義的侵略者，也就成了教化他者的正義之師。因此，在討論《水經注》裏所呈現的林邑形象時，不能不注意到，描述林邑的文獻都來自漢族文人，林邑的形象因而充斥蠻荒與恐怖。《林邑記》以「咸驩」為分界，因為咸驩是漢代九真郡的邊緣。咸驩以南，景物大變：

咸驩已南，羸鹿滿岡，鳴咆命嘯，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²⁸

原始、熾熱、吵雜，觸目所見都是稀見的熱帶動物，連鳴聲都是「警嘯」，視野為漫天的孔雀所阻斷。人在異地，似乎連自然環境和野生動物，都令人感到恐怖且充滿敵意。居住於此地的人，也很古怪。如松原一地「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朱吾縣一帶的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魚肉，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也」顯然不通商業貿易之法。建築物也「但制造壯，拙稽古」與漢人熟悉的街景有不同的風情²⁹。即使同樣是描述信仰，僧侶筆下的天竺，一派虔誠和樂的圖景，到了林邑，一變為神秘恐怖的象徵：

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豈久存哉？³⁰

從「狀似佛刹」一語可知，寺廟外觀足以讓書寫者辨別建築的功能。但為信仰而建立的寺廟並沒有帶來心安和寧靜，而是與神祠鬼塔的描述、無市里、寡人居、海岸蕭條的觀察結合在一起，營造出一個荒蕪、蕭索、妖異、神秘的氛圍。連宗教場所都彷彿心懷不軌。因為記載的人一為求道的僧人，一為多次交戰後來訪的漢族士人，對景觀的詮釋便截然不同。而當讀者在《水經注》裏看見天竺和林邑被勾勒的形象，可能不會像在閱讀《佛國記》和《林邑記》時對語境和目的有較清晰的體察。反而一概將地志作者的文獻考察視為自然與事實，因此建構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異國印象。

²⁷ 同前註，頁 2999。

²⁸ 同前註，頁 3001。

²⁹ 同前註，頁 3003、3005、3013。

³⁰ 同前註，頁 3014。

如果讀者直接閱讀《林邑記》，很可能可以從作者的身分、書寫的目的和主題意識到，他對異地的描述帶有書寫者自身的主觀。一如《佛國記》，全書展現了一個明確的尋求佛法的僧侶記憶。然而，當酈道元選取了《林邑記》片段，凸顯林邑一帶的荒蕪和奇詭，再輔以其他文獻裏關於日南的敘述時，《林邑記》作者主觀的見證似乎就成了於史有據的地理事實。酈道元一邊呈現林邑國的歷史、風土、物產與中原有極大不同，一邊不忘以漢文化為主體，以道德教化收束這一奔逃的屬國。譬如介紹「日南」一詞時，他引了范泰《古今善言》裏的故事：

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邪？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日亦俱出于東耳。³¹

皇帝與張重這番應答，顯示出遙遠的日南對於身居中央的帝王而言，如此陌生。雖然日南歸屬漢廷統治，但這並不表示日南對於洛陽人而言，和鄰近的地域或一直同屬漢文化的其他州郡，是一樣親近熟悉的「我國」。相反的，即使是「擁有」日南郡的皇帝，對於日南來人最為好奇的事，也是基於地名而來的兩地差異，可見彼此之間的陌生和對「他者」的好奇。如果將北向視日的提問與洛陽無影的地中思想和《世說新語》裏「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的童言童語相互對照，則詢問望日的方向絕非僅僅只是一種對自然現象的好奇³²。從張重伶俐的回答、有理有據的舉例、不必皆有其實的斷語，以及「日亦俱出于東耳」的陳情，可以看出這番對話的意義，關涉了族群、主從、內外之間的張力。即使遠及日南，依然具備與中原「日亦俱出于東」的一致性和認同感，豈非有顧榮「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的表忠心意味？

日南作為中原與林邑之間的前線，日南人對朝廷的服從及文化上有意為之的「一致性」，都說明了德化遠播的有效性。在共同的中央政權之下，日南和中原不應有所區別。而酈道元所介紹的林邑國之建立，原本就是趁中原之亂而為：漢末初平之亂，象林功曹之子區逵攻殺縣令，自立為王，這才有了林邑國。《水經注》一

³¹ 同前註，頁 2997。

³²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榻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整理：〈夙惠十二〉，《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頁 590。

再強調林邑國繼承序列之亂，聲明是因為當地國無文史，才會宗胤滅絕。區逵的外孫范熊繼位傳了兩代後，又有奴僕范文自立，注文中還引《江東舊事》強調范文原為揚州人，輾轉流落交州再到林邑。所以，林邑王室居然原為被賣為奴的漢人。而到了范文以下六世的林邑王陽邁，因與其子陽邁二世父子同名，而被酈道元評論為「昭穆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也」³³。無論林邑的風俗如何，酈道元都要以傳統的昭穆制度來審視陽邁父子的作為，並以此做出國之將亡的定評。

因此，凡是林邑當地的物產，必然是不及中原多矣的殘次品。例如，居於此處服桂成仙的桂父，便將此處的鳥類鳴聲比附為「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而在漢地不得志而流浪林邑的文人俞益期，則在書信中寫到當地特產檳榔樹「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而此處飛禽更是「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歸哉？」³⁴ 林邑國所生產的動物和植物都具有「戀土」的性質，而當地的土產也必須受到「不得北植」的評價。沒有人去問林邑一帶的禽鳥是否承認中原是牠們的原鄉，也不必深思為什麼對於生長在南方的植物而言，是否能夠移植北方是一種合理的評價方式。因為酈道元所搜集到關於日南、林邑、扶南以外的描述，幾乎都出於少數能企及遠方的漢族文人。他們在當地的見聞受到了自己的處境、出行的目的影響，成為回音遠遠地傳回給那些「不在場的人」³⁵。正如酈道元對《佛國記》的剪裁與其他求道文本的拼貼，他對林邑的形象也有所選擇和強化，譬如他略過了曾為奴僕的林邑王范文「人情漸附」的由來與神蹟。一直因為不貢而被攻打的林邑，其實也進貢過多次，林邑的景色也不只神祠鬼塔，還有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天光」這般明亮的景色³⁶。《林邑記》還記載了當地的檳榔：

³³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頁 3015。

³⁴ 同前註，頁 3015-3016。

³⁵ 田曉菲論及中古行旅記遊時指出，「紀錄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滿足留守在家的聽眾」，是在場的人為不在場的人所寫的。本文立基於此，試圖指出《水經注》不僅是為「不在場的人」所寫，同時也是「不在場的人為不在場的人」所寫。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頁 69。

³⁶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 1717b、3504a、3745b、3736b。

檳榔樹大圍丈餘，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末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沙沙如涌蕞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十數子。家有數百樹雲踈如墜繩也。³⁷

這段敘述非但沒有《水經注》所引段落的奇異詭譎，甚至還頗有熱帶風情與雅趣。舉羽扇掃天的譬喻既貼切又浪漫，且具有想像力。這段敘述中，更未曾以漢地、北方的標準去評判熱帶的植物。但這些段落都沒有被選進《水經注》。一如俞益期對檳榔的描述，也不僅有不耐北植的評價，反而與《林邑記》的描述頗有相似之處。甚至也有「似竹而中空外勁」的美譽，以及徜徉其下「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的悠然³⁸。由此可見，這些書寫者對於邊境乃至異國的認識，是零星、片面且有許多不能企及和周全的地方，可能塑造出某一種特地的風土印象。而同樣「不在場」的酈道元作為一位地志作者，透過自己的剪裁拼貼，再一次凸顯了這些主觀的描述及片段的認知，並搜羅進他大部分翔實細密的河道彙整之中，再輔以其他文獻佐證這些主觀的記載。最終導致了主觀感受成為客觀知識，而地理書寫也成為地理事實。書寫當下的語境、情景、立場和修辭被淡忘，成就了漢族文人對他鄉異國的認識和記憶。

四、結 論

地理志作為一個實地考察與資料累積以供統治之用的文體，很容易讓讀者認為是可借鑑、可信的知識來源。因此，當地理志裏出現「域外」的記載，書寫者的如何得知資訊、如何化用他人記載，以及關於域外地理的真實與想像之比例輕重究竟如何拿捏，並且以此可以看出時人如何看待身處的世界及陌生的遠方，因而更為人所好奇。而將「地志」和「真實」之間的關係置於《水經注》的學術史脈絡下，更參與了酈道元為何書寫南方、如何書寫南方，以及是否正確書寫南方的經典論題。

本文聚焦於〈河水注〉和〈溫水注〉，探討酈道元對天竺和林邑的書寫。於是發現，他並不避諱天竺和林邑是他鄉異國的事實，也無意將兩地收進漢帝國以降的

³⁷ 同前註，頁 4436b。

³⁸ 同前註，頁 4473。

政治版圖。他所做的僅是極力搜集各類文獻與口傳耳聞，試圖逼近世界的邊界。不論印度或越南、柬埔寨，終究是酈道元不熟悉也未曾前往的地方，因此他只能仰賴前人的陳述。而這兩個遠在中原王朝控制範圍的邊界或之外的國度，漢族文人所能掌握的訊息和知識始終是零星而片段的。只能倚靠偶然地、基於各種原因前往的人群留下的紀錄。或因求道，或為隨軍靖邊，或是立身無地下的流浪，都有其主觀的立場、書寫的目的和文體的傳統。這導致僧侶筆下的求道聖地印度、文人筆下屢犯不改的蠻邦越南，以及流浪者不情願的異鄉林邑在《水經注》裏呈現截然不同的風貌。在此同時，作為引述者的酈道元也透過自己的選擇、剪裁，從容勾連了不同的文獻，強化了單一的地理情境和印象。最終導致在歷史上與中原政權比較沒有交集的印度，呈現出居民虔誠信佛、安居樂業、處處是平原流水、人畜無害的景色；實際上漢人更早接觸、更熟悉的越南，卻野鳥蔽天、林蔭障日、處處是流血和廝殺的印記。雖然酈道元在陳述當地物產風土呈現出有別於中原的景象，但在行文上他卻極力拉近異域和本土之間的距離。關係和緩的印度，於是有了競行仁義、服食近似中國的化內之民；關係緊繃的越南，則人民住在樹上、不通貿易、父子共名，連檳榔樹和飛鳥都洋溢著思歸中土的情緒。或褒或貶，中原標準始終是衡量外邦的唯一準則。換言之，陌生的天竺反而像是同胞，而不斷進行交流的林邑則被視為蠻荒的他者。

由上述的對比可以發現，當地理志作者援引不同素材納入地理志之中，不但使得既有的文體傳統、書寫語境都被解消，同時在引述的過程中也必然有他自身的立場和意圖。地理志積累文獻、不帶有個人體驗或評斷的特色，使得個人的觀察被落實、定義成了當地的地理實景。如此一來，修辭成為徵實，抒情成為描繪，地理書寫成為地理事實。這引發了讀者反思的契機：如果追求真實是地理志唯一的書寫標準，那麼描述陌生的異域似乎成為不可能。而當地理志的記載容許道聽塗說，容許想像和體驗，提供給讀者的異地印象似乎不可能是完全的「地理事實」，但透過親臨現場的人們咀嚼品味之後歸來的回音，或許才是認知異域的一種真實。